

## 从中国到世界：邵培仁学术理念发展进路及传播思想探究

周颖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中国

**[摘要]** 邵培仁的传播思想及学术理念发展和成就同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三十年行路历程正好相互契合，其传播思想与研究领域因遵循中国传播研究主题的流变而持续演进、转化和升华。鉴于此，文章对邵培仁教授传播思想进路做了四个阶段的划分：1988-1998年为传播理论及学科交叉研究初探；1998-2008年为媒介经营管理理论体系建构；2008-2015年为传播交叉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学术寻根；2015年至今从事面向未来、走向亚洲、放眼世界的传播理念探索。邵培仁的传播学研究表现出五种特色：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学科交叉，融会贯通；学术寻根，立足本土；立意高远，国际视野；严谨踏实，情致诗意；快乐学术、与人为善的治学风格与学术特色。其丰硕的理论成就与独特的人格魅力大大推动了传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一位冷静而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他不仅发表、出版大量学术论著，致力推进传播学研究的学科进步；而且聚焦理论创新，积极促进传播学研究的视阈拓展；同时还汇聚思想群落，引领建立传播学研究的浙大流派；更加注重扩展学科建制，广泛拓展传播学研究机构。

**[关键词]** 邵培仁；传播思想；理论成就；中国传播学

### From China to the World: A Study on Shao Peiren's Progressing Path of Academic Idea and Communication Thoughts

ZHOU Ying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hao Peiren's academic ideas and communication thoughts represent that of 30 years'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Hi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research fields change with the evolution and variation of the subject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is respect, this paper tries to divide his train of academic thoughts into four periods: 1988-1998, preliminary study on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1998-2008, constructing the research system of Media Management; 2008-2015,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on cross-over studies and academic root-seeking; from 2015 to the present, explor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that facing up with future, Asia and the world. Naturally, his academic style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ross-disciplinary studies, academic root-seeking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 personal qualities of rigorous scholarship and deep sincerity. As a Chinese scholar, his prolific works have helped to push forward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als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discipline system. Moreover, his efforts on gathering academic groups together and expanding the disciplinary establishment enable the ZJU School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be established.

[ZHOU Ying. *From China to the World: A Study on Shao Peiren's Progressing Path of Academic Idea and Communication Thoughts*. *Academ Arena* 2017;9(10):5-17].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2. doi: [10.7537/marsaaj091017.02](https://doi.org/10.7537/marsaaj091017.02).

**Key words:** Shao Peiren;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y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聚一方人。人与环境的有互动关系是十分微妙而有趣的。1985年，彼时还未进入复旦大学读书的邵培仁教授在一路调研中来到杭州，西湖苏堤的美妙景致与杭州绝妙的人文氛围成为文人学者心中绕不去的情愫，那时的杭州大学以及1998年后的浙江大学成为邵培仁教授耕耘学术、传道授业的一方天地。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代传播学研究学者，邵培仁教授的传播思想与研究领域流变似乎早已同传播学东渐的行路历

程相契合，在将近四十多年的传播学理论耕耘中，其丰硕的理论成果以及极富启发性的传播思想不断丰富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体系及理论范式，从传播学的“阳光模式”、“整体互动模式”到“五次传播革命”、“五大传播生态观”、“五种传播生态规律”再到“媒介地理学”和当下的“华莱坞”概念、“新世界主义”理念等，邵培仁教授的“学术敏感”与“学术创新”持续填补着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为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交叉化、国

际化开辟美好愿景。

### 一、中国传播学行路历程与邵培仁传播思想流变

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传播学研究于五四运动时期东渐进入中国，它事实上是一个“西学东渐，自觉自立”<sup>①</sup>的过程，西方学科及西方理论的引入并不意味着中国本土传播现象的缺失，先秦诸子的辩证传播思想以及华夏大地历代学术著作的络绎不绝都标志着中国本土传播理念及传播思想的源远流长。19世纪以来传播学首次由美国引入，其间经历了几次巨变。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在冷战及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商业文化等的驱动下形成了一个跨学科、整合式的学科体系并得到政府、非政府组织、军事组织等的大力支持，研究范式也由上个世纪初的芝加哥学派的质化研究转而走向哥伦比亚学派所提倡的量化研究，传播学研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可谓如火如荼，而在中国大陆却还是一块全新学术领域或被作为“精神污染”以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1982年，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创始人、教授——施拉姆访问中国大陆高校及科研机构，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它标志着美国传播学的第二次东渐。传播学的第二次东渐有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传播学研究有了引进教材；第二，引进主体由过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扩充为新闻学者、社会学者、心理学者等。李彬教授总结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三次突进：“第一次突进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主题是通过西方传播学的引进，对传统新闻以及宣传理念进行改造”<sup>②</sup>，第二次突进则由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本世纪初，其主题为“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规范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第三次突进则由2008年延续至今，其关于学术自觉、学术主体性的探讨将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化研究推向了学术前沿<sup>③</sup>。

在“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下，引进与本土化始终伴随着中国传播学的发展。邵培仁教授正是看清了这一学科发展的大势，站在了历史的潮头。回顾中国大陆传播学东渐与突进的发展路径，我们会发现邵培仁教授的传播思想与研究领域正是因循学科发展规律并结合中国社会现实，不断创新研究主题，让传播学在中国学术领域不断跑马圈地，保持传播研究领域的扩展、流变，从而持续演进、转化。其传播思想的发展进路也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 （一）第一阶段：1988-1998年 传播理论及学科交叉研究初探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研究与思想领域逐渐解冻，传播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引进对象，当然就研究状态来说，“整个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学’的整体面貌还处于混沌和萌芽状态，对传播学的跨学科起源、分支研究领域的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思想流派等知之不多，更无法顾及理论研究和生成理论的社会历史与知识脉络之间，具有怎样整体与个别的联系等。”<sup>④</sup>邵培仁教授抓住了这一时期社会需求与传播学知识积淀之间的矛盾，于1985年前后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同戴元光、龚炜两位同学一起拜师钻研、相互切磋、合作出版了国内首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和应用》，邵培仁教授主要撰写了书中关于受者、传播技巧及效果的相关内容。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传播学的著作。即便在这部主要以介绍西方传播理论的著作中，邵培仁教授在他负责的篇章中已经将传播生态观、传播与地理的关系等独创观点进行了表述。与西方理论强调二元对立截然不同的东方和谐生态传播观念在传播学引进之初就已经显出雏形，这印证着中国传播学从初创阶段就开始有立场地走自己的路。1988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传播学界引起热烈关注，一度成为当时各大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必选教材。该书可以说是集传播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历史叙事与理念创新于一体的佳作，出版问世后被传播学专著及论作多次摘引。1991年该书被评为甘肃省优秀图书，1992年先后获得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教材）二等奖。

《传播学原理和应用》的出版顺应了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的第一次突进主题，在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理念的基础上改造旧有的新闻与宣传理念，推出了国人自主编著的传播学论著。作为一本国内首创的传播学著作，其“较为新颖的学术观点、严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翔实的叙论文字，不仅显示出新一代学者的进取精神，而且一直影响着当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的路径与话语”<sup>⑤</sup>。而在时代环境和研究背景下，该书大胆创新、小心论证，在传播学研究资料匮乏、学者多以引进和翻译为主的趋势下提出了对传播技巧、传播效果与信息关系的思考与探讨，可以视为对彼时传播研究主题的超越。

《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在艰难中起步但也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新局面，此后邵培仁教授出版了中

<sup>①</sup> 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32-43页。

<sup>②</sup> 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32-43页。

<sup>③</sup> 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32-43页。

<sup>④</sup>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第7-21页。

<sup>⑤</sup> 陈兵：《邵培仁与中国当代传播学》，《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31-136页。

国内地首套传播学系列书籍《当代传播学丛书》，其中包括《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教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等国内首创性学术专著。这套丛书的推出可谓邵培仁教授在传播学与多学科交叉研究层面的首次尝试，学科交叉初探不仅要求学者具有扎实的传播学功底与知识积淀，同时还要求学者广泛涉略跨学科知识、博采众长。正如他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在成为媒介管理学和传播学领域的‘职业选手’之前，就像一只忙碌而又没有明确目标的蜜蜂，看到书就像蜜蜂见到花，对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等方面的书都饶有兴趣，读得废寝忘食。这种左冲右突、无固定目的地折腾，竟使自己受益匪浅，啃下了古今中外许多大部头的理论书籍，从而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开拓了视野，积蓄了能量。”<sup>①</sup> 学术基础的夯实也转变了他关于传播学的研究思路：“传播学并不应当简单等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就其新进性、边缘性的特点来说，相关的研究理应更加突出其对于操作的指导意义。”<sup>②</sup> 这就意味着传播学研究应该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传播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打开了这套丛书的大门，《经济传播学》在科学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系统探索了经济信息采集、搜索、鉴别、选取、加工、传递、接受与转化的流程，辨明了经济传播活动与现象的实质与发展规律，考察了传受二者对媒介的控制、各种谋略间的复杂关系等，夏文蓉教授曾点评该书“引导我们由社会的表层形貌进入深层结构，由经济传播的现时状态透视未来趋势，进而展开丰富而合理的预示性想象和推理，使本书的内容不仅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具有影响力，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有了延伸和跨越的可能”，“具有学术上的前导性和预示性。”<sup>③</sup> 此套丛书的后续之作则结合政治学、教育学、艺术学及新闻学学科研究体系建立了传播学别开生面的研究模式。1996年，邵培仁教授出版了集其传播学众多重要思想于一体的《传播学导论》，这些专著的出版大大提高了他在传播学领域的学术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其中不少传播思想填补了国内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推动了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的范式革新与发展进程。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为：

第一，梳理评判典型传播模式，提出传播学的

阳光模式与整体互动模式。传播模式是传播学者正确认识传播现象的桥梁与中介，在梳理与评判了已有经典传播模式的基础上，邵培仁教授认为“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传播模式是不存在的。任何优秀的传播模式都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印记、标明认识的间隔，同时存在着某种残缺性、暂时性、模糊性和简单化等缺点”<sup>④</sup>，据此他提出了依据网络传播或互动传播现状及趋势的阳光模式和整体互动模式。阳光模式是指“以宏观的整体的眼光所抽象出来的通过信息交换中心（如邮电局）连接各大信息系统进行信息创造、分享、互动的结构形式，它包括六大要素和四项因素”<sup>⑤</sup>。而整体互动模式则充分考量系统内部与系统外部的相互关系，“重视传播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整体关系以及人类传播的全部现象”<sup>⑥</sup>。这两大模式在摆脱西方模式缺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播活动与传播现象的具体实际，对人类一切传播现象作出综合概括与全面描述，其对“传播现象用唯物、辩证、整体、发展的眼光加以分析，被传播学界认为是独树一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sup>⑦</sup>。

第二，超越已有的传播学研究突进主题，提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建设的必要性。在绝大多数学者以传播学海外专著引进与翻译工作为主之际，邵培仁教授就强调了传播学本土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论者指出，传播本土化研究是邵培仁教授至今仍然为之思考、探索的一大学术目标。<sup>⑧</sup>他在《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指出传播学研究应该突出中国特色，让它成为一门中国化的学问。传播学本土化是为了“让传播学成为中国大众的精神食粮”，“让传播学成为适应中国需要的科学”，“让传播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让传播学的理论建树与世界文化接轨”<sup>⑨</sup>。当两岸四地就传播学中国化与传播学中国特色发生争论时，他分析认为：“中国化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以古为主、以今为辅，致力于中国文化中传播理念和传播智慧的展现和宏扬；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以今为主、以古为辅，着力于中国当代传播活动中现象的分析和问题的解决。它们虽各有侧重，

<sup>④</sup> 陈兵：《邵培仁与中国当代传播学》，《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31-136页。

<sup>⑤</sup> 邵培仁：《传播模式论》，《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159-169页。

<sup>⑥</sup> 邵培仁：《传播模式论》，《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159-169页。

<sup>⑦</sup> 肖容：《整体互动论：独树一帜的传播模式——略论邵培仁的传播学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第138-141页。

<sup>⑧</sup> Guo Xiaochun, "A Pathfinder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A Glimpse of Professor Shao Pei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China Media Research*, Vol.11, No.1(January 2015), pp.55-67.

<sup>⑨</sup> 邵培仁：《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62-64页。

<sup>①</sup> 杲如：《让有价值的历史与记忆同行——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邵培仁教授》，《世界经理人》，2011年11月4日。

<sup>②</sup> 杜骏飞：《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略论邵培仁同志传播学研究实绩》，《淮阴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第79-82页；复印报刊资料《新闻学》1992年第3期全文转载。

<sup>③</sup> 夏文蓉：《评〈经济传播学〉》，《淮阴日报》，1990年4月16日。

但并不互相排斥。相反，它们都以“本土”为研讨的核心，以“本土”为耕耘的园地，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支持，相互靠拢，协调共进。”<sup>①</sup>传播学本土化应该是一种对根的追寻，对干的审视，是华人传播学者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省和文化自信。可以说在此阶段提出的传播学本土化建设议题是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冒险精神的。因为，在1989-1991年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最为低迷之际，该学科被斥责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sup>②</sup>，此后较长时间的传播理论引进与与应用也多停留在被动接受的基础上，介绍与研究著作及论文还多流于表层理论观点的阐释，对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动机了解不足，在理论的实践与应用上也存在生搬硬套的问题。有些学者一来认定西方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二来则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对西方理论生硬解读。在此阶段，邵培仁教授呼吁两岸四地传播学者联手本土化建设，强调传播学既要追根溯源，也要服务当下，这不仅正确预测了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针对彼时传播学研究争论及困境提出了解决之道。

第三，提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当有学者提出“我们将化为泡沫”和“大众媒介即将走向消亡”的观点时，邵培仁教授以人类传播史上发生的五次革命为例，认为传播媒介、传播符号以及传播科技始终呈现出叠加式和整合性的发展状态，即每当新的传播革命爆发，旧的传播手段与传播媒介并不会随之被抛弃、走向消亡，相反，“总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又出现在新的传播活动之中，它们的生存与发展似乎不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法则，好像更符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原理。”<sup>③</sup>每一次传播革命的发生不是压缩了而是拓展了文化演进和人类活动的空间，它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步调一致，且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我们不应持对媒介形态的发展与进步持悲观的态度，而应该对由不同文明程度引发的传播革命的先后次序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信息鸿沟、信息侵略等社会问题保持警惕。

第四，开展传播学跨学科研究，践行交叉化的中国传播学创新路径。邵培仁教授的《当代传播学丛书》着重研究和阐述了以传播学为母题与政治、经济、教育、新闻、艺术等进行交叉化研究的新兴边缘学科，而他主编的《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特别是他的《媒介生态学》《媒介地理学》等书则体

现出传播学、媒介学同其它学科、理论进行交叉互动、多维渗透、立体观照的研究态势。在他看来“中国传播学研究主张多元视维，既是为了同传播学综合的、交叉的、多元的特征相适应，也是为了与大众传媒发展的激增性趋势、多样性趋势、集约性趋势、跨国化趋势、商业化趋势相适应”<sup>④</sup>。凡是与传播学研究相关联的多元要素，都可以从特定窗口和视角进入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内，传播学研究应该广泛摄取多学科的研究视角、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做多变量、多层面的立体观照与分析”<sup>⑤</sup>。当时有学者指出传播学的分支研究将肢解传播学的基础研究，邵培仁教授认为，传播学分支研究与基础研究不是一分为二、相互排斥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枝干相连的。一方面，基础研究能够促进分支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分支研究也能补充、完善基础研究，“基础传播学不会因向分支传播学输送养料而变得支离破碎，分支研究也不会因向基础传播学回送营养而‘变性’”<sup>⑥</sup>。

## （二）第二阶段：1998-2008年 媒介经营管理理论体系建构

邵培仁教授学术研究历程的第二个阶段将研究视野转向了媒介经营管理。20世纪90年代，传播研究无法在新闻及传媒体制变革方面有所突破，但转而在传媒发展与市场经济方面有了结合的契机。正如这一时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协同发展一般，新闻传播研究也开始走向学科交叉与协同发展。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开始自觉调整自身与社会及市场间的关系，因此在中国传播研究的第二次突进中，“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开始围绕新闻传播研究主题发生了变化，人们更乐于在新闻、经济与文化变革等领域进行摸索”<sup>⑦</sup>。这一阶段的传播学研究聚焦市场及经济领域，学者们关注的议题更倾向于媒介的市场运作与经营管理。围绕大众传播业的市场化问题，学者们开始重新考量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和经济角色，在凸显媒介经济功能的同时，对媒介伦理道德及法制管理的研究也成为新的主题。在此阶段，邵培仁教授接连出版了《媒介经营管理学》《媒介管理学》《媒介管理学经典案例》《媒介战略管理》《媒介管理学概论》《知识与大众传媒》《电影经营管理》等著作，这些著作运用管理学、传播学、市场营销学等多种学科对中国媒介管理进行综合性研究，建

<sup>①</sup> 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两岸传播媒体迈向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台中，1998），后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36-41页。

<sup>②</sup> 新华社《对外参考》1984年第9期。《文汇报》1984年5月13日。转引自戴元光：《社会转型与传播理论创新》，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4页。

<sup>③</sup> 邵培仁：《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7期，第5-8页。

<sup>④</sup> 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媒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sup>⑤</sup> 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媒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sup>⑥</sup> 陈兵：《邵培仁与中国当代传播学》，《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31-136页。

<sup>⑦</sup>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第7-21页。

构了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和媒体实际的理论体系。

邵培仁教授在发表了《论新闻媒介经营与改革》《新闻媒介管理改革浅议》《互动共荣：市场经济与新闻传播》系列论文之后，于1998年8月出版了《媒介经营管理学》——国内第一本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专著。首先，该书以宏观研究视角考察了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广告公司、电影公司等传媒经营主体，从媒介经济、媒介产业以及传媒营销等多元视角阐释其市场运作规律、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功能，周密的理论体系与扎实的研究框架将学术研究中零散的媒介经济现象组织为一个整体。其次，该书与此前的同类著作最大不同点是多学科交叉研究，作者以在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领导学等方面的学术积累以及媒介领域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此书赋予了理性而科学的论述。再次，作者在写作材料搜集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行业资料，从美国、港台大学图书馆以及互联网获得了许多最新文献，因此材料详实、信息新鲜、观点新颖。在书中，邵培仁教授创造性地运用“讯息”概念来补充媒介管理的“4M要素”（人、财、物、讯息），并强调信息资源及人力资源相较于以往受众及广告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对媒介经营管理八大原则的确定、对六大职能的论述、对两大规律的总结、对中国传媒市场化四种特点的概括、四种承包模式的分析，都充分表现了作者突出的理论洞察力和思想的先进性”<sup>①</sup>。

1999年出版的《知识与大众传媒》则顺应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浪潮及传媒变革趋势对大众传媒的特点与功能及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变革与趋向做了立体式扫描。这本书被认为是一部“前瞻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佳作”<sup>②</sup>。该书的前瞻性在于它预测了知识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对信息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阐释全新经济形态与大众传媒间的互动关系以提示人们如何在知识经济萌芽的大潮中未雨绸缪、迎接挑战。其现实性则在于该书立足本土实践，在知识经济这一全新议题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传媒文化的策略，从而推动两者的协同发展。作者指出，知识经济的发展将“加速各种文化的传播和相互融合”，也必然“引起冲突”<sup>③</sup>，其对理性与感性材料的采集和论述表现出作者直面现实、直面“冲突”的勇气。

2003年出版的《媒介战略管理》一书被认为是

“一部媒介管理学的扛鼎之作”<sup>④</sup>，全书围绕媒介战略环境、媒介战略形成、战略管理过程等理念展开对媒介长期整体发展技巧及策略的研究。媒介管理一般分为战术管理和战略管理，前者关注媒介在短期内的局部运作成效，而后者则聚焦媒介长远的布局规划。该书最大的特色便在于其经验总结与理论实践能为媒介领导者出谋划策、作出正确的媒介经营方略，因此它既反映了新世纪以来媒介管理研究的前沿理论，又紧密贴合“我国改革开放和媒介产业发展需要的应用性理论”<sup>⑤</sup>，表现了该书紧扣时代脉搏的创作特色。

其他著作如2002年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媒介管理学》、2005年的《电影经营管理》以及2007年的《文化产业经营通论》等均在此前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扩展与学科交叉，这些著作的问世表明邵培仁教授的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已形成其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其出版的媒介管理研究教材更是解决了媒介改革和高校教学的燃眉之急，为中国传媒成功“入世”带来了运营谋略与技巧。总的来说，其创新性观点、前沿性理论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不难发现，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第二次突进中，“新闻传播与经济发展、公共关系、广告经营研究、传播技术、媒介使用研究等，不断形成研究的大势和主题”<sup>⑥</sup>，伴随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以及网络化进程的加速，对信息传播、新媒体对大众传播的影响的研究也趋于增加，而他在此阶段的开创性著作及论文成果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同时也准确把握了信息社会信息自由流通理念对传媒领域的改造及未来可能带来的改变，此阶段邵培仁教授主要传播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媒产业变革，预测传媒未来发展的十种新趋势和新走向，提出媒介产业全球化的中国对策。他认为未来媒介发展的十大趋势在于：媒介产业将向全球化、国际化方向转变；媒介企业将向做大做强和集团化方向发展；媒介人才将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演变；媒介生产将向产品的个性化、柔性化、多样化方向倾斜；媒介将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向经营多元化方向发展；媒介营销将以提高市场占有率、赢得受众信赖为目标；媒介财务管理将向战略型、集成化方向发展；信息传播与发送将以快速满足受众需求为核心；媒介创新将是媒介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媒介组织结构设计将以小型化、扁平化、精干化为

<sup>①</sup> 傅伯荣：《系统·科学·新颖——评邵培仁、刘强〈媒介经营管理学〉》，《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49页。

<sup>②</sup> 傅伯荣：《前瞻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佳作——评〈知识与大众传媒〉》，《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第160页。

<sup>③</sup> 邵培仁、江潜：《知识与大众传媒》，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sup>④</sup> 袁舟：《一部媒介管理学的扛鼎之作——评邵培仁新著〈媒介战略管理〉》，《新闻实践》，2003年第10期，第50-51页。

<sup>⑤</sup> 袁舟：《一部媒介管理学的扛鼎之作——评邵培仁新著〈媒介战略管理〉》，《新闻实践》，2003年第10期，第50-51页。

<sup>⑥</sup>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第7-21页。

方向<sup>①</sup>。与此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是幸还是不幸，媒介全球化对中国传媒产业而言是机遇还是挑战的问题，邵培仁教授在其《媒介全球化：是机遇还是挑战？》一文中指出“对于我国的媒介产业来说，这既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正视现实，迎接挑战，主动适应并服务于经济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是我国媒介产业争取生存空间、谋求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sup>②</sup>在媒介产业全球化背景下，他及时提出了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基本对策：“第一，参与媒介全球化进程，争取媒介全球化权益；第二，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培养和造就媒介人才；第三，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第四，引进和走出兼顾，联合与创新并举。”<sup>③</sup>毫无疑问，21世纪前后迎来了传播学研究的新环境，一方面中国加入WTO组织表明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将塑造中国融入国际的程度与状态，另一方面媒介技术的普及与更新也为传媒产业及体制转型带来挑战，在此基础上，以全球化及社会转型为背景的传播学研究成为新的主题。邵培仁教授的全球化思考应运而生，提出了中国传媒“顺应时代潮流，遵循传播规律，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传媒变革进路无疑正确而敏锐地把握住了社会转型阶段的理论与实践需求。

第二，提倡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建设“媒介特区”。在经济特区逐一建立的基础上，邵培仁教授提出建立“媒介特区”的概念，他呼吁“中国媒体产业要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地参与媒介全球化竞争，参与过程和策略应沿用改革开放以来一贯采用的‘渐进式’的小范围试验的策略，选择沿海开放城市作为试点，建立‘媒介特区’，在试验成功后再逐步推广”<sup>④</sup>。他认为，媒介特区的建立既可以为海外传媒进入内地市场建立“缓冲期”，以此为中国传媒加入国际竞争提供练兵场，又能够推动我国媒介市场运营体制的进化与完善，为传媒产业高效稳定发展塑造理想的市场氛围。在此过程中，媒介特区的改革试验既包括同跨国媒体展开交流合作，也包括尝试管理体制革新，更包括利用媒介特区熟悉媒体产品国际贸易规制，建立媒体市场规则等。媒介特区概念的提出无疑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性，它在中国经济特区概念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媒介特区概念，让中国传媒产业变革与体制转型有章可

循、有据可依，有理可凭，能够真正结合中国国情建立中国传媒产业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机制。

第三，关注数字鸿沟、信息污染与媒介恐慌等概念及媒介传播现状，指出信息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媒介危机。信息污染主要包含“有害性和有毒性信息、虚假性和伪劣性信息、重复性和图像性信息”<sup>⑤</sup>等，数字鸿沟是指“地区、行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等差异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sup>⑥</sup>，媒介恐慌论是指“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论或受众理论”，媒介恐怖论则认为“对恐怖行为和暴力活动进行大规模报道，符合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和新闻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sup>⑦</sup>邵培仁教授对以上现象及概念的解读、关注与对策研究表明其对全球化时代媒介危机和媒介问题冷静而犀利地思考，这些探索不仅试图解决中国本土的信息污染与数字鸿沟问题，同时也深入传媒危机的国际视阈强调媒介对信息报道及传播所应遵循的社会责任及专业原则。

第四，以批判视角重新审视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以及舆论监督、流媒体技术、隐性障碍、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等议题。在此阶段，邵培仁教授的传播研究没有停留在传播经验研究层面，同时也踏足传播批判研究领域，在其《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中，作者重新评价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理性化’的抽象性话语，也被实证学派的理论学家认为难以捉摸、不易验证，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他们以宏观的视野研究关注媒介的运作以及媒介和社会、媒介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结合自己的观察和特殊的人生经历，提出了一系列旗帜鲜明、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观点，取义是值得肯定的”，但过于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又是值得反思的<sup>⑧</sup>。而对舆论监督、流媒体技术、市民新闻、隐性障碍、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等议题，作者亦发表中肯看法，既认定媒介对舆论的控制力，又强调媒介本身不应为所欲为；既肯定新媒体技术对媒介变革的影响，又关注传统媒体与流媒体的整合发展；既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抱有积极态度，又提醒大众谨慎处理媒介集团改革进程中的困境与悖论。

### （三）第三阶段：2008—2015年 传播交叉研究的

<sup>①</sup> 邵培仁：《论中国媒介经济管理的前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4期：第23-28页。

<sup>②</sup> 邵培仁：《媒介全球化：是机遇还是挑战？》，《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1-6页。

<sup>③</sup> 邵培仁：《论媒介产业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新闻通讯》，2001年第11期，第18-20页。

<sup>④</sup> 邵培仁，颜伟：《媒介特区：中国参与媒介全球化竞争的“实验田”》，《中国电视经济节目——运作·经营·管理》论文，北京，2001年。

<sup>⑤</sup> 邵培仁：《信息污染已成为新的社会公害》，《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2期，第20页。

<sup>⑥</sup> 邵培仁，张健康：《关于跨越中国数字鸿沟的思考与对策》，《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25-132页。

<sup>⑦</sup> 邵培仁：《媒介恐慌论与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第27-29页。

<sup>⑧</sup> 邵培仁，李梁：《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102-109页。

## 理论创新与学术寻根

自2008年中国传播学30周年后,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立显著增强,30多年的引进吸收、消化批判让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获得了“批判吸收、自主创新”<sup>①</sup>的特质与能力。此阶段,学者们对传播学的翻译引进工作已基本转向原著阅读以及理论创新。中国传播学界直面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海外的传播学理论及科学要素同中国丰富的社会现实与历史经验相结合,如何在梳理整体学术脉络、借鉴学术精华的同时完成学术寻根之旅。另一方面,随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复质疑以及对传播学“欧美范式”的深刻反思,传播学西方理论的“普遍性”及“普世价值”被动摇,而非西方世界话语权的增强尤其是中国世界地位的提升正逐渐影响着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建设。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学术自觉及学术自立为目标的理论创新正通过跨学科研究得以实现,而华人传播学者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借鉴中华文化传统的学术寻根之旅也开始日甚一日。此阶段,邵培仁教授的交叉化和本土化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其研究成果的多元视维、宏大视角及多级模式正建立起全新的学科知识大厦。

其实其实邵培仁教授的政治、经济、教育、新闻、艺术、社会与传播学的分支传播研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交叉化研究,但是他在交叉化研究上最为突出的成果是《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和《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前者从生态学角度重新考察了传播学和媒介学现象及规律。“媒介生态研究不仅从总体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一种全新的视野,而且在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创造性的成果。”<sup>②</sup>在著作中,他以生态哲学范式为核心,从整体主义出发提出“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sup>③</sup>,进而梳理了海内外媒介生态学的十大理论、提出了媒介生态的五大核心观念、五种主要规律,详细论述了媒介生态种群、生态集群、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等概念,最终面向中国的媒介环境,在“融通的生态理念、交叉的学科特征和开放的研究范式”<sup>④</sup>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媒介生态发展的良方。

2010年出版的《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一书既秉承媒介学、地理学这两门学科

的优良传统和遗传基因,又吸收了多学科活性因子和知识营养,建立起“人-媒介-社会-地理”的研究体系,它侧重于将“媒介现象尤其是传播活动现象放到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并探索其本质与规律”<sup>⑤</sup>。全书着力于解决中国与媒介地理息息相关的八个议题:媒介产业的地理形势研究、大众媒介的生态状况研究、大众媒介的传播环境研究、媒介传播的“地形图”研究、媒介的地方性和本土性研究、媒介的扩散性和整合性研究、媒介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研究、各种媒介与地理环境的互动研究<sup>⑥</sup>。纵观全书,考察人、媒介、社会与地理间的互动关系、结合多学科展开的知识背景以及以学术前沿为主体的理论视阈让这本书兼具全面性、跨学科性及国际视野。

2009年至2015年相继出版的媒介理论三部曲《媒介理论前沿》《媒介理论前瞻》以及《媒介理论前线》“大力拓展了媒介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界”<sup>⑦</sup>。这几本书聚焦最前端媒介理论,通过宏大架构、多维视野和立体思维,对媒介生态、媒介地理、媒介融合、媒介时间、媒介人种、媒介仪式、媒介国运、媒介安全、媒介演化等36种媒介理论与媒介研究进行了整体诠释与理性评判,对其诞生溯源、表现形态、演化路径、研究特性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全景式、立体化审视,探讨了各种理论和研究即将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观点,三部曲封顶之作《媒介理论前线》对整个媒介理论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划分出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酝酿期(1988-2001),成长期(2002-2008),成熟期(2009年至今)<sup>⑧</sup>,并总结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四个特点:“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紧追前沿的前瞻性特点;各种学科互相渗透、彼此互动、杂交融合的交叉特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的丰厚土壤,并努力同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交流的本土化特点;敢于提出新概念、新命题、新主张、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想的创新性特点。”<sup>⑨</sup>全书进而总结了中国传播学交叉化研究的三个阶段及类型、本土化研究的现状与走向,三大部分的内容细致梳理了“中国媒介理论研究发展的脉络,进一步预测中国媒介理论探究的发展趋势

<sup>①</sup> 李彬, 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32-43页。

<sup>②</sup> 邵培仁:《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sup>③</sup> 邵培仁:《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1期,第25-26页。

<sup>④</sup> 郑虹:《媒介的生命乐章与绿色之旅——读邵培仁教授的〈媒介生态学〉》,《全球传媒观察》,2009年1月21日。

<sup>⑤</sup> 邵培仁, 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sup>⑥</sup> 邵培仁, 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sup>⑦</sup> 黄清:《媒介研究的新视界——评邵培仁教授主编的〈媒介理论前沿〉》,《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1期,第112-114页。

<sup>⑧</sup> 廖卫民:《冲锋在前线:一个传播学学派的崛起之道——解读邵培仁主著之媒介理论三部曲》,《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67-72页。

<sup>⑨</sup> 邵培仁:《媒介理论前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20页。

势”<sup>①</sup>，对前两本书的研究内容具有统领作用。综合来看，从前沿到前瞻再到前线，六年时间打磨出一套连贯的学术进军全景图，不仅勾勒与阐述了洋洋大观的媒介理论新成果，更是展现了邵培仁教授带领一众学者壮大学术团队、打造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浙大学派”的决心。

2014年出版的《华莱坞电影理论：多学科的立体研究视维》是邵培仁教授理论创新的又一力作，全书对华莱坞电影的概念、研究宗旨、发展策略、景观再现、跨地合作等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扫描。作者在书中指出：“华莱坞电影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华人电影与‘莱坞’的简单重合，也不是对两者的硬性拼凑；既非对华人电影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的历程总结，亦非对表象的简单描绘。”<sup>②</sup>该书试图用宏观的视角由东方转向世界，用博大的胸怀接受世界华人影像，通过全新理念与视角以避免从“个别方向、个别角度去谈论、界定甚至论争我们的电影工业”<sup>③</sup>。根据电影发展的历时性脉络，邵培仁认为，“中国电影曾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民国电影时期（中国电影1.0，1905—1949年）、民族电影时期（中国电影2.0，1949—1979年）、华语电影时期（中国电影3.0，1979年至2012年）三个研究阶段，那么，从2013年开始，中国电影已经迈入了4.0时代，亦即华莱坞电影新时代。”<sup>④</sup>预示华莱坞电影及其研究将进入黄金期。

学科交叉、理论创新、国际视野、本土实践，这些重要的传播研究主题成为邵培仁教授在这八年从事理论耕耘的核心指针。在交叉创新与学术寻根的过程中，一些崭新的观点和理论聚合为此阶段独具特色的传播思想：

第一，提出媒介生态的五大核心观念及主要规律。邵培仁教授指出，媒介生态的五大核心观念，如媒介生态整体观、媒介生态互动观、媒介生态平衡观、媒介生态循环观以及媒介生态资源观共同构成了媒介生态观念群，这五大观念相互联系、相互蕴含，帮助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媒介生态活动及生态规律。另一方面，他提出媒介生态的几大主要规律：媒介生态位规律、媒介食物链规律、媒介生物钟规律、媒介最小量规律、媒介适度性规律，五大规律关注传播从微观到宏观之间各有机部分的互动关系，聚焦各要素发挥的生态效用。五大观念及规律

的提出能够有效解释和应对一系列媒介生态问题，为中国传媒产业变革与发展提出一系列媒介生存策略。

第二，提出以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尺度为核心的媒介地理学概念。邵培仁教授提出并阐述了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尺度这五大核心概念的内涵与意义，这五大核心概念既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又可单出抽出用于媒介地理现象与媒介地理活动的分析，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实用性。这些概念的提出构成了媒介地理学跨学科、综合性的和有梯度、有层次的分析框架。在这五大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合理认识当下媒介发展与未来演进的地理要素，合理利用地理因素以维持中国传媒生存的活力与动力，进一步激发中国传媒竞争潜力，从而形成中国媒介体系生态循环、健康和谐的良好运作机制。

第三，提出华莱坞电影概念，转变了“中国电影”及“华语电影”的概念局限。邵培仁教授认为，华莱坞就是“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华地之电影，它以华人为电影生产的主体，以华语为基本的电影语言，以华事为主要的电影题材，以华史为重要的电影资源，以华地为电影的生产空间和生成环境”<sup>⑤</sup>，华莱坞概念的提出不仅弱化了“中国电影”概念的意识形态意味与政治歧视倾向，让来自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华人所在地的学者们能够坐到一起谈论电影，同时还避免了“华语电影”概念用单一的语言框架来界定电影的的局限性，从而将“跨地互动”的概念引入到电影研究从资金、技术到文化、市场等的各个层面。总之，华莱坞理念的提出与建设既是对传播学本土化的践行与探索，也将成为超越政治界限与意识形态差异，促使华地文化同全球文化文明交往、积极对话的重要路径。

#### （四）第四阶段：2015年至今 面向未来、走向亚洲、放眼世界的传播理念探索

2015年后，邵培仁教授的学术研究逐渐面向未来、走向亚洲、放眼世界，在总结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引向更为广阔时空范畴的新世界主义。近三年来其传播研究视线主要聚焦中国、聚焦亚洲，更观照中国与亚洲世界在国际领域内的参与角色及传播实践。

首先，邵培仁教授提出了传播理论研究的亚洲主张，主张建立传播学研究的亚洲范式及理论体系。他认为传播理论的亚洲主张不同于传播理论的欧洲/美国中心主义范式，也不同于亚洲中心学派的亚洲中心主义，而是从亚洲的三个面向入手——历史传统的亚洲、西方经验的亚洲、现代转型的亚洲——探索传播学发展的亚洲之路。亚洲主张的提出能够

<sup>①</sup> 邵培仁：《媒介理论前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sup>②</sup> 邵培仁：《华莱坞电影理论：多学科的立体研究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

<sup>③</sup> 邵培仁：《华莱坞电影理论：多学科的立体研究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

<sup>④</sup> 邵培仁、陈江柳：《华莱坞：拥抱中国电影4.0——兼论历史、现状与未来》，《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28-41页。

<sup>⑤</sup> 邵培仁：《华莱坞电影理论：多学科的立体研究视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建立亚洲传播与东方传统的理论框架，探究亚洲文化本身对亚洲传播模式的形塑，用亚洲自己的文化根源、时空结构、言语结构来解释自身的传播行为与传播活动，更能够倡导将中国传播学科的文化地理视线拉回亚洲，探寻中国传播研究与亚洲接轨的共通之处，从而促进国际传播背景下亚洲国家的文化交往与文明对话。

2017年出版的《亚洲传播理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亚洲主张》是对此前观点与理念的汇总，此书将研究视野拉回亚洲，全书关注国际传播视阈下亚洲声音的渐强与亚洲意识的重归，正视亚洲传播智慧与亚洲传播经验的觉醒，以亚洲文化特性为前提，以东西文化交流为核心，以当代亚洲情境为基本立足点，既“探讨了亚洲古典传播理念的丰富价值，又阐述了亚洲传播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走向，对亚洲传播理论的产生、演进与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详细的理论勾勒，并通过丰富的学科脉络探讨了亚洲传播理论在区域政治、跨文化、大众媒体、新闻、广告、电影等领域的应用。”<sup>①</sup> 全书研究的宗旨在于：反思和超越“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研究路径，提出以“对话和共享”作为亚洲传播研究的理念，并致力于化解亚洲内部的区域冲突、重构相互认同，为全球传播与人类交往提供新的启示<sup>②</sup>。毫无疑问，亚洲传播研究不仅是华人学者在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及学术寻根之旅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更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传播变局中的新定位与新角色的桥梁与中介。

其次，建立新世界主义理念，构建中国传媒发展与改革的新空间。邵培仁教授已先后发表了6篇新世界主义与传播方面的论文，他认为，新世界主义是指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所持有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及其行动方案”<sup>③</sup>。其理论体系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反对地域保护主义，主张人才物讯自由流通、开放合作；反对利己主义，主张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生共荣；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主张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平发展；反对否认、歪曲、篡改历史，主张牢记历史，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他认为，新世界主义理念必将向政治、经济、外交、贸易、文化、安全以及传媒等各个领

域延伸、扩展，甚至有可能渗透进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它将给中国的传媒发展和改革带来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透过邵培仁教授的研究成果与传播理念，我们能勾画出一幅其由本土化入手逐渐扩大视野，面向未来、走向亚洲、放眼世界的学术进军路线图。在传播学本土化道路上，他观照中国、关注亚洲；在传播学国际化进程中，他既考察世界之于中国与亚洲的意义，又强调中国在亚洲及世界的地位。总之，其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路径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共生共存的整体。

综上，邵培仁教授在近40年的传播学耕耘中，在传播理论和传媒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从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起步，邵培仁教授先后在政治传播、艺术传播、教育传播、新闻传播、经济传播、传播社会、媒介经济与管理、媒介生态、媒介地理、影视传播等很多领域做出了开拓性工作，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贡献卓越。阳光模式和整体互动模式在传播理论模式领域进行了大胆突破。邵培仁教授在媒介经营与管理方面的研究一直紧密结合传媒业界实践，对传媒业界发展进行前瞻和反思的同时，对传媒变革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在貌似庞杂的诸多研究领域之中，一条一以贯之的创新思路始终明晰可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社会实践。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行各业蒸蒸日上，传播对社会各领域都具有建设性意义，政治、艺术、教育、新闻、经济、社会等都与传播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此时的年轻学者邵培仁以犀利的眼光抓住了这一社会脉动，迅速地将这些研究领域以传播为中心加以探讨，形成了一系列论著。西方传播理论必须落地才能体现出应有的意义，邵培仁一面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传”的智慧，另一方面更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将传播学与当代中国鲜活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所以他在《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中涉及到了传播与生态、传播与地理的关系，强调媒介、生态与地理之间的和谐关系，在《政治传播学》开篇便着重强调了“政通人和”四个字，并创造性地绘制了传播互动模式图。很明显，“平衡”、“和谐”、“互动”等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倡导的精髓从邵培仁的研究伊始就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根基之中。这一理念也始终伴随着他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新世纪以来的《媒介生态学》和《媒介地理学》则将这一理念进行了集中表述，集中体现了邵培仁教授的理论高度与价值；近年来的传播学亚洲主张、好莱坞电影研究和新世界主义理念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传播应有的作为与风范。

## 二、邵培仁治学风格及学术特色

三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见证了传播学的从无到

<sup>①</sup> 邵培仁：《亚洲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亚洲主张》，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sup>②</sup> 黄清：《亚洲传播研究：连接地方经验与全球视野的桥梁——评邵培仁教授等人的新作〈亚洲传播理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亚洲主张〉》，《中国传媒报告》，2017年第3期，第125-128页。

<sup>③</sup> 邵培仁，周颖：《国际传播视域中的新世界主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流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94-104页。

有,从初创到兴盛、从肤浅到复杂的学术历程。回溯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我们不仅看到了传播学科建设从被动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转向,同时也在这个自主自立的过程中见证了学者们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与全球化辛勤耕耘的身影。“中国的传播研究是否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能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此作出自己的思想建树,将如此丰厚的专业遗产化解为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学理与学统”<sup>①</sup>,在治学之路上,邵培仁教授的学术自信、学术敏感与学术自觉不仅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范式与新视界,更为中国知识界转变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打开学术研究新局面树立了榜样,其治学风格与学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 (一)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创新是对现实的改革与对现状的突破,无论是在传播学领域还是媒介经营管理领域,创新都是邵培仁教授历来秉持的学术精神。一方面,创新是学者凭借学术敏感性探究未知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创新又是积极勘误现实、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害怕由新思想冲击而引发的旧有知识大厦的土崩瓦解,但他始终强调:“在传播学领域,不要受太多固有陈规的束缚,这样那样的顾虑对于学术创新是有害的。如果学术研究没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其‘创造’过程极易蜕变为‘制造’过程,学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sup>②</sup>正是在“做前人未做之事”信念的引导下,他敢为天下先,编纂了一些列国内首创性学术专著,提出了大量新的概念、观点与理念,更是敢于发起学术争论、打破学术禁忌、促进学术生产。正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格推动他在有待开垦的学术领域辛勤耕作,成为中国传播学领域走在最前端的开拓者、“探路者”<sup>③</sup>。

### (二) 学科交叉、融会贯通

传播学起源于多学科的介入与汇集并持续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体系与研究方法,可以说学科交叉研究成就了传播学独立自主的学科地位。邵培仁教授指出:“交叉化不是两个以上学科简单生硬的相加,而是各个学科在思想和方法上的有机融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交叉化研究也是培养新的学科生长点,实现中国传播学‘短道超越’、‘先声夺人’、‘后发制人’的重要路径”。<sup>④</sup>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交叉化探索让其在传播学分支研究与传播学基础研究间找到了平衡,其组织编纂的《当代传播学丛书》《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倡导的传播学研究的生态学、地理学转向事实上都是传播学新、旧元素的组合与多学科因子的嫁接杂交。学科交叉、融会贯通的学术特色让其传播学理论顺应时代变化趋势,能不断应对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与新局面。

### (三) 学术寻根、立足本土

在回答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在哪里这一问题时,邵培仁教授言简意赅:“中国传播学的主要问题是西方化,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本土化,突破点是交叉化,目标是国际化,但最佳的学术生态是自主、多元与平衡。”<sup>⑤</sup>自从事传播学研究起,他便致力于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与中国化,指出中国传播学需要学术寻根,积极实现“去西方化”与“去西方中心主义”。其关于华人本土传播、好莱坞电影、亚洲主张、新世界主义等理念的提出、阐释与探究正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借鉴西方理论精华的学术寻根与学术创新之举。其学术寻根、立足本土的治学准则真正实现将传播学研究根植于中国实践,“在社会、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变动之中,密切把握社会的动脉……完成对当下中国社会传播结构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sup>⑥</sup>。

### (四) 立意高远、国际视野

对国际视野及传播学建设国际化的强调绝非等同于“全球化”,在邵培仁教授看来:“国际化是指大学认同国际理念、拥有国际标准、获得国际认同、进行国际对话的过程;而全球化则是追逐全球市场、资源全球共享、产品全球流通、信息全球传播的过程。前者是高标准严要求,意味着质的提高;后者是高效率大流量,意味着量的扩张。”<sup>⑦</sup>因此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并非屈从于“西方中心主义”,而是主动塑造中国传播研究的独立话语体系,积极向世界传递传播研究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与中国情境,更是“积极地向世界展示并使用能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兼容的中国版本”<sup>⑧</sup>。他聚焦国际传播变局、关注国际学术潮流的研究进路实则用国际环境能够理解与接纳的方式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以此促进不同文化及学术共同体间的文明对话与价

<sup>①</sup> 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32-43页。

<sup>②</sup> 吴筱颖:《喜欢做前人没做过的事——访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邵培仁教授》,《浙江大学报》2004年6月4日。

<sup>③</sup> Guo Xiaochun, “A Pathfinder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A Glimpse of Professor Shao Pei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China Media Research*, Vol.11, No.1(January 2015), pp.55-67.

<sup>④</sup> 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sup>⑤</sup> 徐峰:《邵培仁:本土化、交叉化、国际化是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三个维度》,《新闻论坛》,2016年第4期,第23-26页。

<sup>⑥</sup> 吴飞:《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生产场域透视》,《当代传播》,2009年第4期,第4-10页。

<sup>⑦</sup> 徐峰:《邵培仁:本土化、交叉化、国际化是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三个维度》,《新闻论坛》,2016年第4期,第23-26页。

<sup>⑧</sup> 徐峰:《邵培仁:本土化、交叉化、国际化是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三个维度》,《新闻论坛》,2016年第4期,第23-26页。

值互镜。

### (五) 严谨踏实、情致诗意

在邵培仁教授看来，学术研究就是一副沉重的思维十字架，学者们要敢于耐住寂寞，要在漫长的学术马拉松中始终秉持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严谨踏实不仅仅反应在对知识的敬畏与尊重上，如始终将学术诚信与学术道德放在第一位；更表现在对学术规范的严格遵守以及对学术价值的孜孜追求中。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枯燥而寂寞的学术研究常常带给人以沉思和遐想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之旅就该在漫长乏味的文献梳理与文字创作间备受煎熬。“书斋生活……也带给你成就感和满足感”<sup>①</sup>，他对文学、艺术、诗歌、绘画等的喜爱为其学术研究增添了一抹情致诗意，《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一书以学术散文的方式阐述了其丰富多彩的学术观点，优美诗意的文字与娓娓道来的观点令人憧憬与向往，思想的力量与情感的力量凝聚为一个整体，这是学术作品褪去华丽、贴近生活非常难能可贵的尝试。

### (六) 快乐学术、与人为善

邵培仁教授的学术理念不仅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同时也能与现实相契合进而让学术研究与学人培育成为充满生活气息与人文关怀的快乐之旅。其亲和、快乐、睿智的人格魅力不断为学生与同事带去前进的能量。作为导师，邵培仁教授常常在学生最为困惑与艰难的时刻给予关怀和教诲，宽严相济的培养理念像学生们学术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催人奋进。作为同事，他也总能在第一时间察觉老师们在工作与生活上的压力与难处，适时给予宽慰与帮助。作为学者，他始终将学术作为与人交流沟通、建立情感的方式：他组织的学术午餐会让师生之间的关系变得亲近温暖、惠及新闻传播学子；他参与促成的传媒“三门聚会”让天南地北的学者汇聚一堂，在自由轻松的学术氛围中获得观点的碰撞；他积极创办的华莱坞学会与每年召开的华莱坞年会让电影学者及电影爱好者共赴学术盛宴，其包容谦虚的人格魅力建立起广泛的学术人缘。在它看来，学术研究是轻松愉快的，更是学者们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的途径，一如他始终秉持的座右铭“待人以诚、与人为善”一般，快乐学术、宽以待人已成为他传道受业、为人处世的准则并时刻成为师生们效仿的榜样。

## 三、邵培仁学术成就及学科贡献

做一个有良知、冷静的中国传播学者，这是邵

培仁教授一贯的坚持。在个人治学风格及学术特色的引导下，他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就并推动学科体系不断完善，近40年来逾300篇论文（不完全统计）及40多本专著可谓高产，而其学术活动与理论成就对传播学建设的推动与促进更是不可小觑。

### (一) 汇聚思想群落，引领建立传播学研究的浙大学派

邵培仁教授始终强调：“学术研究不应该只是个人特立独行的沙漠之旅，而应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共同进行的思想冒险、智力竞赛和人文工程。学术研究也要与时俱进，提倡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学术合作。”<sup>②</sup>来杭工作后，他始终致力于汇聚思想群落，积极培养学术人才、编辑队伍以及展开学科建设，努力与学科同仁一道建立起把握时代脉搏、紧贴理论前沿的学术团队。从2002年起，邵培仁教授亲自筹办了《中国传媒报告》和《CHINA MEDIA RESEARCH》杂志季刊。这两本学术刊物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传播学者创新成果发布的先锋园地的建立。2002年，在邵培仁教授的带领浙江又于全国率先成立了浙江省传播学会和浙江省会展学会，同时他与其他学者一道在浙江大学建立起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省级传播学重点学科、省重点研究基地和省重点创新团队以及国家动漫教学基地和国际华莱坞学会等。

可以说每一次的学术进军都离不开群落汇聚与集团协作，在一次次学术成果问世的背后蕴含着邵培仁教授网罗人才、统帅全局的努力。“作为领军人物，邵培仁教授凭借着其澎湃的学术热情、敏锐的学术洞察、开阔的研究视野，亦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方面的最多产学者，在培养、带领‘浙江学派’并引领‘浙江学派’在媒介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是邵培仁教授对中国乃至世界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贡献。”<sup>③</sup>所谓学派，“即在某一学术领域内逐渐形成具有共同学术取向的学人群体，这样的群体中往往都有其最具领导力和代表性的核心学者，周边围绕着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学人，他们的总体研究成果能够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或学术范式，产生较为深远的学术影响。”<sup>④</sup>邵培仁教授在《21世纪媒介理论研究丛书》基础上又重点推出媒介理论研究三部曲，事实上标志着传播理论研究浙大校派的崛起。整个浙大校派，均以浙大校友为背景，参与者有博导、教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博士后以及硕士研究生，他们在共同的学术

<sup>②</sup> 陈兵：《邵培仁与中国当代传播学》，《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31-136页。

<sup>③</sup> 张健康：《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总结与展望》，《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2-12页。

<sup>④</sup> 廖卫民：《论传播学中国学派生成的条件、路径与机遇》，《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61-68页。

<sup>①</sup> 章东秩：《学术呼唤良知：访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邵培仁教授》，刊于王永亮、成思行主编：《倾听传媒论语》，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人民网，2004年2月10日。

目标与学术追求下在国内外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具有创新和开拓性质的传播学专著和论文。邵培仁教授指导博士生对媒介和谐论、媒介演化论、媒介崇拜论、媒介身份论、媒介认同论、媒介偏见论、媒介人种论、媒介品牌论、媒介转型论、媒介融合论、媒介记忆论、媒介愿景论、媒介排斥论、媒介框架论等二十几种媒介前沿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逐渐在国内外形成影响，整个团队也成为了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领跑者。博士团队中的“十大金刚”、“八朵金花”等学术新锐正在迅速成长、脱颖而出，成为浙大学派持续稳定地开拓创新的不竭之源，成为影响和引领中国传播学术潮流和走向的重要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批学者的学术成果不仅丰富了媒介理论，同时其学脉、学统、学质的一脉相承塑造了传播学研究浙大学派的真容。

## （二）编纂学术专著，致力推进传播学研究的学科进步

三十多年来，邵培仁教授将近30本专著和300余篇论文的问世，不仅建立了传播学科全新的研究体系与理论框架，更是推动学科建设不断前进、开拓创新。其大量专著和论文都是中国大陆传播学首创性和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有些书亦能填补彼时学术研究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邵培仁教授的大量著作作为学科教材，不仅解决了传播学教育改革及教材紧缺的燃眉之急，更是以独特的理论体系及理念表达影响了传播学科的教育体系，《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和《媒介管理学经典案例》先后获得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教材）一、二等奖，作者个人也于2007年荣获教育部/宝钢优秀教师奖。

邵培仁教授撰写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传播学》多次修订再版，基本理论体系跟随时代的发展和传播研究的进步不断调适与更新。在立足本土、突破创新的基础上，该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推进自主创新、形成本土特色的重要成果，而且让我们领略了我国新一代教科书的独特风情”<sup>①</sup>。而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数本专著均在该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地位不俗。总之，学术专著及教材的编撰不仅让邵培仁教授获得了大批优秀教材、著作及观点奖项，更是因其“不选用西方学术中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来解释我们同样不熟悉的东西，而是选用本民族的为大家所熟悉的东西来论证观点与概念”<sup>②</sup>的著作风格增强了学者的学术自觉、读者的文化自信与学科建设的本土化。

<sup>①</sup> 邱芳烈：《立足本土 突破创新——评邵培仁的〈传播学〉》，《今日科技》，2003年第5期，第29页。

<sup>②</sup> 邱芳烈：《立足本土 突破创新——评邵培仁的〈传播学〉》，《今日科技》，2003年第5期，第29页。

## （三）聚焦理论创新，积极促进传播学研究的视阈拓展

邵培仁教授总结：“综观自己的学术之旅，其实就是碰撞、发现、探索、行走与耕耘之旅。”<sup>③</sup>在理论与观点的碰撞、探索与耕耘中，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传播观念与传播理论应运而生，它们的诞生不仅转变了传播学研究“拾西方人牙慧”的旧局面，更是积极拓展了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阈。

鉴于邵培仁教授在学术研究中突出成就，他于2004年荣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8年荣获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传媒思想人物奖，先后被浙江大学评定为9级最高岗位和国家二级教授。2015年邵培仁教授因其文章高发表量、高被引量和高中心度被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授予“中国传媒经济学科杰出贡献奖”，同时其率先提出的“华莱坞电影”学术概念被授予“中国传媒经济年度观点奖”。学术观点奖项是对邵培仁教授学术理念与观点创新的嘉奖，更是对其理论创新学术研究理路的认可与欣赏。在颠覆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创新之旅中，学科成熟逐渐成为可能。诚如邵培仁教授在其书中提到：“物种繁衍靠复制，学术研究靠创新。创新是中国学术的灵魂，质量是中国学术的命根。中国传播学研究只有不断进行学术创新、提高学术质量，才能在国际学术竞争和发展中处于有利位置，也才能赢得主动权、发言权和平等对话、受人尊重的权利。”<sup>④</sup>相信其辛勤拓荒、钻研实干的学术精神将不断引领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浪潮，进而为传播学研究的范式革新、视野拓展及学科进步带去福音。

## （四）扩展学科建制，广泛拓展传播学研究机构

邵培仁教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研究者，也是成功的管理者。他在学系、学院和学部分管教学工作期间，曾先后对本科教学计划进行多次修订和完善，构建了金字塔式课程建设模型，成为许多高校新闻传播学系制订本科教学计划时的参考。<sup>⑤</sup>作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他整合科研队伍，引领浙大传播学研究的发展，组织的学术午餐会也被评为浙江大学院系文化建设优秀成果。担任学院党委书记和人文学部副主任期间，兼任学校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为学科发展、对外宣传做出了贡献。全国很多高校、特别是浙江省的高校，都邀请过邵培仁教授谋划传媒专业发展与科研队伍建设。不仅如此，邵培仁教授还将自己悉心培养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输送到各大高校，加强了这些学校传媒专业的

<sup>③</sup> 陈兵：《邵培仁与中国当代传播学》，《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31-136页。

<sup>④</sup> 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sup>⑤</sup> 何扬鸣主编：《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口述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6页。

科研实力。在这些博士生中，已有多人在不到 40 岁时已评上教授。这些源源不断的传播学后来人在攀登新的科研高峰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各个高校的传媒类专业学科建制，而他们共同的恩师邵培仁教授的思想与功勋也将随之传扬下去。

**作者简介：**

周颖（1990- ），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华莱坞电影研究、传播学理论研究。

10/13/2017